



程方平 著



希望从这里升起

——中国的学校儿童教育

中国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书系

BOOK SERIES ON CHINESE CHILDREN'S
SURVIVAL PROTECTION & DEVELOPMENT

30
4b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S SURVIVAL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中国儿童生存、保护和
发展书系

G630
C546

希望从这里升起

HOPE RISES HERE

——中国的学校儿童教育
—— China's Schoo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程方平 著

by Cheng Fangping



A0771155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6年·成都

前 言

中国 1949 年以来的历史表明，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利于重视教育和民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现代社会的任何进步与生产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因而离不开教育。教育对振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作用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并愈来愈得到重视。教育的发展已成为今日世界的一大潮流，甚至可以说 21 世纪是教育的世纪。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教育传统的国家。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从未间断过对教育的关注和支持。在教育制度、教育法规、教育思想、教育技术、教材教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遗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教传统。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儿童教育始终是最受重视，经验最丰富的部分。翻开中国教育史的篇章，儿童教育是颇具色彩和相当成熟的，可以从中探寻我们中华民族形成、繁衍、

2 希望从这里升起

发展、壮大的根源，可以发现我们民族性中的许多利弊得失，还可以挖掘数不清的精神财富。

进入 20 世纪以来，中国的儿童教育在中外文化教育的碰撞之后，经过长期的阵痛，孕育出新的教育模式和观念。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推动着新时代教育的车轮，立足于中国社会的沃土，追赶着世界教育的潮流，注入了毕生的心血，才换来了教育的今天。在 12 亿人口的大国，面对两亿多人的就学负担，中国政府和千百万教育工作者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考验，才使今天的中国儿童教育事业得以发展，并汇入到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之中。

着眼于历史，中国儿童教育的变化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着眼于现实，中国儿童教育负担沉重，百事待兴；着眼未来，则应找出差距，发现问题，广开思路，振奋精神。国外一些未来学者认为，21 世纪世界经济文化的重心将由西向东，移至亚太地区，21 世纪将是“太平洋的世纪”。这表明 21 世纪对于中国是充满希望和机会的世纪。而其中最关键的是中国应该培养出高质量、高素质的各类人才去把握这一难得的机遇。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必须从儿童抓起。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共识，并历久弥新，在今天有着它更丰富和深刻的含义。人们逐渐认识到，面对 21 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靠民族的整体素质，高质量的教育和明确合理的法规制度来保证我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一些经济文教发达的国家尚且为本国的儿童教育问题而担忧，表现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作为我国，基础教育条件较差，水平较低，负担较重，面对许多新问题还缺少成熟的经验，因此，更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切实负起责任。应该使全社会都意识到，办好

基础教育，为培育儿童花大气力、投入大量资金，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求”，而且是典型的“长期行为”。如果忽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或是放纵“误人子弟”的质量效益问题，断送良好的机遇与前程，将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

近几年，儿童教育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重视，联合国签署了《儿童生存、保护与发展世界宣言》，我国依此并结合国情制定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为儿童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政策保证。借此东风，我们不仅要用科学的眼光审视中国儿童教育的历史与现实，更应该调整儿童教育的思路与规划，把“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落到实处。21 世纪的中国儿童应具备哪些素质？中国的儿童教育怎样实现现代化、国际化、科学化？需要继承和发展哪些优良的教育传统？哪些因素制约儿童教育的发展？对此，需要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和每一位公民作严肃、认真和科学的思考，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中国的儿童教育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课题，是一项艰苦的、系统的工程，必须从“终身教育”的全过程，人类发展的大视野，未来世界的无穷变化等方面着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改革和发展入手。笔者征引众家之说、古今资料，编此小书，意在对我国的儿童教育状况作一些介绍评说，提一些粗浅想法。不成系统，难得全面，仅供参考。

程方平

1994 年 12 月

第一章 温故知新

——对中国传统儿童教育的反思

第一节 蒙以养正 勿失时机

——中国传统的学校儿童教育

生活在 960 万平方千米土地上的中华民族，素以勤劳、勇敢、富于创造和充满智慧而闻名于世界。五千年文明使之早就能用火药、指南针、造纸、活字印刷等重大发明造福全人类。她拥有增产粮棉的精耕细作技术，有预防治疗疾病的中医中药（包括针灸、气功、按摩等）验方、良方，色、香、味俱全的食品烹调，精美灵巧的丝绸服装，园林建筑、制茶、酿酒、陶瓷、雕塑等传统工艺，诗、书、礼、乐、歌舞、戏曲、绘画、书法等灿烂的文化，更拥有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成系统的、而且沿用数千年的文字，至今仍在国际上保持着特有的文明。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在于她一向重视开发人的智能，提高民族素质，广设培养各种人才的教育机构。其教育形式大致有三：传授知识、经验和技能技巧。主要依靠社会上各行各业采取师傅带徒弟式的教育方法，传授日常生活经验、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主要依靠孟母“择邻断杼”式的父传子承的教育方法，传授历史文化和伦理道德；主要依靠古代学校老师对学生言传身教的方法。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组成了古代社会的“大教育体系”。远在2300年前，孟子就以培育人才为最大乐事，儒家学者编撰的《学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教育理论之一，其中就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等可贵的思想。这是对中华民族重视教育事业的突出写照。

根据考古、挖掘和有关专家的研究和考证，远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专供育幼养老之用的公共场所；公元前2100年的夏朝，已有专门培育后代习文练武的学校；到商代时甲骨文单字已达到3500个，包括天文地理、干支、数字、祭祀、大事记录等内容，而且在占卜龟甲上已有儿童上学和学校的明确记载。与此同时，专供书写学习之用的笔、墨、简册相继出现，为学习者提供了基本的学习工具。随着古代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学校教育不断成熟起来，形成自身的完整系统。从西周的明堂辟雍到孔子、墨子、少正卯等的私学和诸侯的家学，如齐国的“稷下之学”，至汉代建太学，隋唐五代出现了国子监控制下的“六学二馆”，到宋、辽、金、元、明、清的庙学、社学、蒙馆、私塾、书院，逐步发展成为我国长达2000多年、涉及面极广的古代学校教育体系。

综观古今，历朝历代都把教育放在“教化人民，治理国家”的首要地位，主要表现政教合一，官师合一，文武合一等综合性特点。在古代小农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按照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上层建筑发展的需要，古代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能“格物、致知、正义、诚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者和为其服务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古代大教育家孔子主张，庶（人口）、富（经济）、教（教育）和“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为立国之本。孔子认为，在不得已时，宁可“去食”、“去兵”，也不能失掉培养“民信”的教育。为此他一生从事教育，打破“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推进民间学校教育的发展。

古代各朝学校的学制是不相同的，长短不一，入学年龄有早有晚，弹性较大。据史料记载，多数朝代实行3—7岁入蒙养馆，8岁入小学（有的朝代15岁），15—18岁入中央官学（相当于现代的中学或大学）。根据官订的人仕考试标准，学子一般要经历“十年寒窗苦”，才能有资格考秀才、举人、进士，“读书做官”是主要的学习目的。

汉代以后，学校采用的基本教材，主要是孔子等人总结、整理、编纂、注释和发挥的，集夏、商、周三代文化典籍而形成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和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宋元以后又加上“四书”即朱熹所注释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在幼儿教育方面先秦时就有蒙学教材《史籀篇》、《急就篇》、《仓颉篇》，魏晋南北朝以后又出现了《千字文》、《蒙求》、《百家姓》、《三字经》、《杂字》、《千家诗》、《童子礼》、《童蒙须知》和多种韵语歌诀等，语言通俗精炼，便于背诵记忆。这些教材，流行很广，深入民间，

专门传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即以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人际关系为主的伦理道德。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指出的“夏曰校，商曰序，周曰痒，学则三代共之，皆可以明人伦也。”至于墨家、法家、道家、农家等百家学说和数学、天文、历法、医学、药学、语言、外语、美术、工艺等内容，在部分专门的古代学校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为中华文明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古代学校采用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是有特色的。以个别教学为主，师生研讨和集体讲授为辅，有一些专门学校中还用了游学、考察、实验、观测等方法。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家，主张采用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学思结合、知行合一、言传身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比较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方法。多数学校一般采用先生讲、学生听、死记硬背书本的注入式方法，有的学校，特别是在书院、国子监“六学二馆”和专门学校中，教学方法相对灵活，出现过研讨、陪读、小先生（导生）、分斋教学、积分制等许多有意义的尝试。

自春秋战国以后，出现了官学（包括中央和地方官学）与私学并举的现象，国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除秦朝曾禁止儒家私学外；在大多数朝代中往往私学规模超过官学，甚至成为官学衰败时延续教育的重要机构。究其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们为了使后代成为有地位的士大夫，或者善守祖业，光耀门楣，自幼就让子弟读书明理，因而民间的蒙馆、私塾和著名学者办的书院，往往超过官学的规模。国家为了广泛选拔人才，在西周就建立了在“乡兴贤能”中选贡士的办法。汉代建立察举制是由政府官吏定期到民间学子中去考察，物色德才兼备的文武良才来当文

官武将。魏晋南北朝改行九品中正制，即由州郡所设的大小中正按照唯才是举的原则，根据文官的政绩、武官的战功，品评推荐，上报司徒、尚书后录用，由九品官起步逐级上升。隋唐以后采用科举制，设常科、特科、童子科、武举和医药、天文、历算等专业考试，以考试成绩、才思智慧、应变能力、分析能力、辩论能力等为依据，起初较为合理，后逐渐僵化。科举制一直沿用到清末的1905年。

在中国，尊师重道的师道尊严是全社会遵行的良好风尚。2000多年前荀子提出：“国将兴，必贵师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他连任齐国稷下学官三届祭酒（首席教授或校长），受到全体学子的尊敬。他倡导将师和天、地、君、亲并列供奉在一起，成为千家万户顶礼膜拜的偶像。这种传统延续2000多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深层意识和自觉行动。如“伯牙学琴”、“孔子问道”、“张良拜师”、“程门立雪”、“唐太宗设宴谢蒙师”等故事便是最生动的表现。

古代学校主要为本朝本国培养人才，有时也为周围邻国开放。不仅在汉唐盛世，就是在南北朝、辽、金、元各代，东亚和近东各国，来华的留学生亦常达数百人到上千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学制，教材教法，蒙学读本，乃至科举制度，都对世界特别是东方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是多民族一体的国家，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丰富多彩，除了大量汉族学校教育外，民族语学校、寺庙宗教活动，经常迁移的马背学校、私塾等较多。各民族在历史上不仅创造了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藏文、满文、蒙文、锡伯文、东巴文、回文、满文等数十种民族文字，也积累了文学、艺术、军事、科

学、技术、法规、民风民俗、宗教思想乃至哲学伦理等多方面的财富，为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物质、精神、文化等多种文明基础。近10年民族及地域文化的研究考古表明，古代地方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虽有发展不平衡的总特点，但部分地区、部分民族的学校教育已相当成熟，自成系统，特色明显，且多与宗教、民俗有紧密关系。

由于受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女性长期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设女校或男女同校被视为大逆不道。虽然唐朝武则天女皇提倡男女皆可求学问艺，有学问的女子也可以做女官，历代也曾有不少女才子，但在历史上仅是昙花一现，大多数女性仍没有学习文化的权利，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明发展的进程。

古代学校的教学活动通常遵从“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古训，死读硬背，脱离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学生大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模仿八股文，学风消极，培养出的多为“五谷不分、四肢不勤”的书呆子。从隋唐开始，学校主体逐渐落为科举的附庸，只有科技、文学、艺术、医药、天文、算学、地理等方面的教学务实而积极，人才层出不穷。

在我国古代学校的特点中，既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积极因素，又有消极落伍的许多问题。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既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宗教、习俗、法律法规、伦理、哲学的制约，又是积累、传播、碰撞、研究、发展这些宝贵遗产的重要场所。

传统的中国教育是终身一贯的，在《颜氏家训》中就发表了早至胎教，迟至垂暮之年的终身教育主张，幼儿教育被提到了相当高的地位。他指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固须早教，勿

失机也。”否则“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成败德”。他特别赞成古代先贤关于“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说法，并引时谚“教妇初来，教儿婴孩”佐证之。

和西方相同，中国的儿童教育初期多为母亲的“膝前教育”，因此家庭的教育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继之，在民间，儿童们上乡校，入义学，进私塾；在官方，入蒙馆，设家学；在宫廷，请师傅，聘名流，形式和内容是多样化的。即便是百工巫医等社会地位低下者，亦有家学师傅等不正规的早期教育作保证，除学伦理道德之外，还要投入大量精力学习工巧技术，作为日后生活的必要准备。

虽然，从总体上讲传统教育是偏重社会标准，忽视个性发展的，但自古以来，尊重儿童天性，尊重人的特点的教育家、思想家也大有人在。《周易·蒙卦》指出：“蒙以养正，圣之功也”。认为自幼受良好的教育对人的一生有重大影响。韩愈著《师说》提出“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的不朽主张，对学生的尊重和理解超过前人，弘扬了《学记》“教学相长”的思想。特别到明清之际，初期民主思想得到弘扬，不少思想家抨击理学对人的束缚。王筠则明确强调孩童是人，不是猪狗，应充分尊重其特性。

总之，千百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儿童教育和学校教育为人类教育史积累了丰富的遗产，包括多方面的理论探讨和经验教训，值得今人认真总结。

第二节 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

——中国传统儿童教育的思想及方法

中国的儿童教育自古有之，除了家庭教育之外，还有一些社会教育设施，这是与中国传统的重教思想和习俗分不开的。千百年来中国处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之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辽阔的大地上要实现有力的统治，除了运用森严的法治外，大量的的是靠“礼治”，特别是教育来完成的，所以历代君王都以“广教化”作为立国之本。此外，历代王朝选贤用能的目的都在维护其统治，选举制度发展到隋唐日趋成熟，使“学而优则仕”成为世人入仕升官的重要和唯一的途径。在这种艰难而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必然将注意力转向早期教育，目的是争取更多的受教育的时间，提高起点，形成优势。

中国的儿童教育思想莫基于先秦，儒家崇礼教，道家法自然，墨家重环境，众说纷纭，各执一端，促进了早期儿童教育思想的繁荣和多元化。古代先哲对教育作用的认识大多以人性论为出发点。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观点，将教育视为人性发展形成的关键。孟子、荀子发挥孔子的思想，提出了“性善”说和“性恶”说，从两个对立的方面同样强调了教育的兴善抑恶作用，是中国儿童教育传统和理论的思想渊源。

对于儿童受教育的能力，古人亦有考察分析，所根据的是生理发育和心理特点，在《大戴礼记·本命》中指出了儿童几项基

本能力的发育时间。人初生时，虽有眼目而不能看东西，虽有嘴而不能吃、不能说，虽有脚而不能行，当然更谈不上接受教化了。“三月而彻眵，然后能有见。”指3个月开始能移动眼眸，注视外界。“八月生齿，然后食。”8个月长出牙齿，然后可咀嚼食物。“期（1年）而生腓（膝盖骨），然后能行。”指满周岁后膝骨发育完善，可以行走。“三年嚙合，然后能言。”指第三年（两周岁）时发音功能完备，可以说话。“十有六，情通，然后能化。”16岁时情感发育稳定，可以接受教化了。这并不是说儿童15岁以前不可教，实际上是强调了不能用教育成人的方法来教儿童。必须适应其情感“未通”的特点，而采取适宜的方式。古之学者认为儿童的特征是：一、喜好活动和游戏。王阳明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指出儿童最害怕受拘束。二、模仿性强。如孟子幼年时，家住墓地附近，就模仿悲泣哭号；后搬到集市附近，则模仿叫卖讨价；后又搬到学校附近，则模仿诵读习礼。三、行为受真实情感支配。如喜则笑、怒则号、悲则啼，不加掩饰。故古谚说：“小儿无诈”。这是褒义的概括；又有“幼者妄行”的说法，这是贬义的概括。四、记忆力好。程颐说：“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记。”颜之推也说他幼时所读诗赋，虽过几十年，能全部回忆起来。后学的东西，即便经常复习，也难以巩固。五、注意力容易转移。清代王筠说：“小儿无长精神。”即是幼儿不可能长时间地从事一项活动，必须适时而止。古人这些论述都从不同角度提示了幼儿身心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特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不过，古代幼儿年龄阶段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直观和经验总结的水平上，缺乏科学的分析和系统的概括。

慈幼是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慈幼”即爱护儿童。儿童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其能否健康成长，是人类社会能否繁衍延续的关键。再则，儿童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必须在成人的哺养下生存，因此，必须得到足够的爱护。它既是儿童本身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慈幼思想不仅源生于父母对子女爱抚的本性，也出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历史责任感。其具体表现为：一是国家对儿童采取优恤待遇。如春秋时期越国规定，凡孕妇临产时，由官方派医生照顾。分娩后发给酒肉以资鼓励。如生双胎，则由官方供给食物。如生三胎，则官方代聘乳母喂养。这些措施后被汉代经师郑玄用作对“慈幼”的注释，成为规范。二是收养孤儿。又称“存幼孤”。春秋时期墨子就曾主张使“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战国时齐国田成子、东汉章帝、唐初太宗等人都曾为收养孤儿者发放救济品。宋代曾在京城附近各郡设过“慈幼局”，专门收容孤儿和弃儿，聘用老年妇女及乳母进行养育，此实为历史上最早的官办育婴堂、孤儿院。当然，在古代这类“慈幼”的“善举”实属凤毛麟角，只是一时的机构。

“慈幼”的观念对早期教育思想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限于优恤和养育，也包括教诲在内。清世祖福临撰《内则衍义》，将“备三母”制也列入“慈幼”的范围，并将慈幼作为“母道之式”，并强调“养己之子以慈，而养人之子尤当以慈矣”，使“慈幼”成为带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推动了早期教育的广泛开展。

在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记载了我国最早的早期教育思想，“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意思是说，若生子，应该在他出生时，就给他今后获得良好的命运打下基础，包括进行早期的保教活动，这是一句后世经常引用的经典语言。

《国语·晋语》中记载，春秋时胥臣对晋文公说：“人生而学，不学不入。”也是强调教育应自初生时就开始。汉代贾谊明确提出“早谕教”的观点，主张“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强调从婴儿时就已经要开始施教了。这种重视和提倡早期教育的态度贯穿整个中国思想史中，并构成了古人论早期教育放在整个人生教育大范围中的重要意义，其思想渊源出自“正本”和“慎始”的哲学观点。《大戴礼记·保傅》中引《易经》之语：“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说明事物的发展取决于开始的定向，作任何事都首先要“正本”，即确立正确的原则、方向。同时还必须谨慎地对待事物的始初，切不可因误差微小而马虎大意。朱熹也强调：“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可见注重早期教育是古代教育家和哲人们的共识。

在对儿童进行教育时，古人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主要包括，注重环境的影响，情感的陶冶，防止溺爱子女，教给儿童正确的语言、道德、方法等；对儿童守信而不欺瞒，循序渐进，培养兴趣和量力而行。此外，教育时人树立正确的优生观，适龄而婚，同族不娶，先正根本。父母不仅教子女以知识、道德，还要教育儿童如何保护自己 and 锻炼自己，如强调父母不应过于照顾子女的温饱，教导孩子如何避险物，绝惊扰，要让孩子有委屈放任地哭泣。如此等等，虽然多是些经验之谈，但有不少的确符合儿童发育和受教育的规律。

中国古代的儿童教育主要是通过胎教，家庭训诲，诵读蒙养教材，从师傅、塾师学习，开展儿童文化生活和做游戏等方式和途径完成的。中国古代自颜之推著《颜氏家训》之后，历代戒子训蒙的著述层出不穷。这是除了知识技能教育之外，渗透到思